

《韓振華選集》之二

《諸蕃志注補》編後記

呈奉在讀者面前的《諸蕃志注補》，是先師韓振華教授生前之心血結晶。此書在他仙逝七年之後，終於得以首次完整地公佈於世，是為中外交通貿易史學界的一大盛事，亦足以安慰韓師在天之靈矣！

眾所周知，《諸蕃志》由南宋趙汝适所撰，乃記載宋代中國與亞、非、歐諸洲各國交通往來及航海貿易的專著。趙氏自序作於寶慶元年（公元1225年）九月，當時他以朝散大夫提舉福建路市舶兼掌泉州市舶事，而泉州正是宋元之際世界最著名的一個航海交通商港。因此，其所著成了研究中古時代中外交通、貿易，乃至海外諸國史事的極為珍貴的文獻，千百年來一直受到中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。

《諸蕃志》自問世後，即為同時代的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所著錄（卷八地理類）。明《永樂大典》收入該書，隸卷四千二百六十二蕃字韻，清《四庫全書》據此予以編錄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七一史部地理類四，及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卷七史部地理類，均有其提要。自清代至民初，該書屢見刊印，先刻於李調元所輯之《函海》（有乾隆初刻本、道光刻本），再刻於《學津討原》、《國學文庫》等。

至若從事該書之校注者，在中外學界也不乏其人。1911年，德國學者夏德（Friedrich Hirth）與美國學者柔克義（W.W.Rockhill）曾將全書譯成英文並加以注釋，以下列之書名出版於俄國首都聖彼得堡：*Chau Ju-kua: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, entitled Chu-fan-chi*。此即中國學界通稱的《諸蕃志譯注》。後來商務印書館1937年所出版的馮承鈞《諸蕃志校注》，曾據諸本互校，並於注釋中酌採夏德、柔克義二氏《譯注》之文或益以己見。1990年（平成三年三月）日本關西大學出版部發行了藤善真澄譯注的《諸蕃志》。近又有中華書局1996年出版的楊博文《諸蕃志校釋》。

鑑於夏德、柔克義之《諸蕃志譯注》，始終未有用漢文全部予以逐譯；馮承鈞《諸蕃志校注》雖云採用譯注文十之五六，唯或全錄或節取或自行變更補充，使讀者難以窺其全豹；況馮氏認為《譯注》“博採西方撰述，注釋頗為詳贍，然亦不乏訛誤”，而其《諸蕃志校注》本身訛誤也在所難免。因此，韓振華先師自二十世紀中葉起，即立志要將《諸蕃志譯注》全部用漢文翻譯出來，並另加補注。

韓師對《諸蕃志譯注》的翻譯及補注工作，持續了將近半世紀。早在1957年，他曾將最初的部分成果發表於《南洋問題資料譯叢》第四期，題為〈趙汝适《諸蕃志》（東南亞部分）注釋（一）〉。此後他一直堅持從事這一功德無量的事業，然因承擔了其他繁重的工作，只能斷斷續續地進行，因而未再陸續發表。甚至直到臨終前，連一篇《諸蕃志注補》序也未見寫成。所幸《注補》的全部內容大體完備，由師母韓丘漣痕女士一一抄正，得以現在此種面目予以刊佈。

由於缺乏韓師自序及撰譯凡例說明，我們在編輯出版此書時，遇到不少困難。下面只能就編輯全文時所見，對全書體例略作說明，以供讀者參考，實不敢自許正確無誤：

（一）《諸蕃志注補》中的趙汝适原文，基本上以馮承鈞《諸蕃志校注》本為準，而易豎排為橫排並略改標點符號。趙氏原文中的夾注〔 〕內文，據馮氏考為李調元注或前人加注。

（二）趙氏原文中的注釋符號，①、②、③等圓圈所列即夏德、柔克義二人之譯注，其文於每節正文後用〔譯注〕標明；〔一〕、〔二〕、〔三〕等括號所列，則為韓振華師自己的補注，其文於〔譯注〕後用〔補注一〕、〔補注二〕、〔補注三〕等明示。“譯注”文中〔 〕號內的文字，應即韓振華翻譯時另加的夾注。

（三）全書卷上各頁眉標上有“東南亞部分”、“南亞、西亞、北非部分”及“海上雜國”等字樣，係據韓師手稿原意予以區別並標示，僅供讀者參考，其地望未必完全符合今地之考證。

雖然本書缺乏韓師自序，然在書首除刊有趙汝适、李調元及馮承鈞等舊序外，又蒙韓師生前學友、原香港大學校長王賡武教授賜序，使全書生色不少。

總之，《諸蕃志注補》一書的出版，使夏德、柔克義二氏的《諸蕃志譯注》本首次全部用漢文迻譯並問世，同時又有幾乎同等份量的漢譯者“補注”刊佈，此乃先師韓振華教授對中外史學界的又一重大貢獻，深信廣大讀者定會得出自己相應的結論。

陳佳榮 錢江

於香港 2000年5月28日

（載《諸蕃志注補》，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0年出版）